

俗文化研究丛书

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哈迎飞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哈迎飞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 哈迎飞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300-8

I. ①儒… II. ①哈… III. ①儒家—关系—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B222.05 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2475号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儒教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

(项目批准号: 10YJA751021)

羊城学者学术带头人项目

“儒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性书写研究”

(项目批准号: 12A011G)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哈迎飞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300-8

2013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5/8

定价: 40.00元

目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以科学代宗教”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思潮

——陈独秀的宗教观及其写作策略

第一节 “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	11
第二节 从“以科学代宗教”到“以主义代宗教”	17
第三节 现代中国的先知书	26

第二章 儒教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气”

——以“非宗教运动”研究为中心

第一节 专制迷信与国人的非理性宗教情绪	34
第二节 “信教自由”与“东方式的攻击异端”	41
第三节 “不可有宗教气而变成教徒”	56

第三章 儒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罪感”意识

——以鲁迅研究为中心

第一节 “吃人的老谱”与《狂人日记》的经典性 …… 72

第二节 “罪”与“吃人”的深刻性 …… 77

第三节 家族伦理与鲁迅的“罪感意识” …… 82

第四节 “我以我血荐轩辕” …… 100

第四章 儒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国家意识

——以老舍研究为中心

第一节 “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 …… 112

第二节 “国家至上”的基督徒 …… 120

第三节 热烈歌颂新中国 …… 134

第五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宗教人”

——以巴金研究为中心

第一节 巴金家族小说中的“宗教人”形象 …… 166

第二节 《随想录》中的“宗教人”形象 …… 192

第六章 中国现代革命作家的“准宗教心态”

——以韦君宜研究为中心

第一节 “回家”与“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 219

第二节 “愚忠”与“革命” …… 233

第三节 “权威服从”与“作恶的工具” …… 241

第七章 儒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变”与“不变”

——以郭沫若研究为中心

第一节 “动的泛神观”与狂放的诗风 …… 253

第二节 “与时俱进”的浪漫诗人 …… 273

第三节 复杂的“双面人” …… 291

第八章 是儒家，但不是儒教徒

——以周作人研究为中心

第一节 儒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 …… 307

第二节 解构儒教“三纲” …… 326

结 语 …… 352

参考文献 …… 355

后 记 …… 364

前言

一

本书主要研究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1]，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主要研究大都集中在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对“不具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2]的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关注较少，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不多。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虽然有许多学者探讨过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作家思想

[1] 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哈迎飞：《“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列耀：《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宋剑华：《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荆亚平：《当代中国小说的信仰叙事》，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喻天舒：《王国维、郭沫若与儒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再复、林岗合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2] 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及创作的影响，但由于对儒家文化的“宗教性”认识不足，因而在准确地揭示中国现代作家与儒家文化的复杂关系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亲近宗教的作家虽然很多，但真正皈依或信仰某一宗教的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作家都声称是无神论者，对于这些作家，儒教的潜在影响和精神束缚往往比有形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更大。20世纪80年代在反思“文革”教训时任继愈先生曾指出：“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有自己不同于欧洲的独特的专横独断宗教——儒教，中国的儒教经常以反宗教的姿态出现，它猛烈地抨击佛教和道教，致使很多人误认为中国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黑暗的神学统治时期，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1]儒教的生命力十分强大，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就会死灰复燃，正如茅于軾先生所说：“全国解放后，作为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来，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清算专制思想的机会，可是到了‘文革’，儒教伦理又死灰复燃，人们佩忠字徽章，跳忠字舞，搞三忠于活动，开忠于什么的誓师大会等。除了忠的对象有可能改变之外，要求我们‘忠、孝’的实质并未改变。电台上、报纸上、讲话中，忠字频频出现，说明这种伦理思想确实是根深蒂固的。”^[2]正因此，本书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儒教入手，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宗教性的复杂关系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

从儒教的角度契入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意识及宗教性写作研究具有

[1] 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

[2] 茅于軾：《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5页。

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揭示以往研究中由于宗教视阈的遮蔽而无法看清的问题，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作家的创作思想和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其次，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总结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和不足。20 世纪 70 年代夏志清先生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尖锐地提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1]的问题，引起学界广泛的争议。本书认为，倘不抓住儒教问题，泛泛而谈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得失关系，很难对转型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宗教性这一敏感而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作出深入的、有价值的判断。第三，有助于深化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本质与特色的认识。众所周知，现代性的主要理念如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等，在西方主要是在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持续对话与辩论中产生的，因此，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时，我们既不能忽视西方文化的宗教性背景，同时，又要认识到，就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而言，其实也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宗教问题，那就是没有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的“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而这一点，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重视得还远远不够，正因此，笔者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对我们更深入地把握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本书要突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认识儒家文化的宗教性。

[1] [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2 页。

长期以来，国人大多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宗教情绪和宗教意识也不发达。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也有自己独特的宗教问题。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儒学究竟是否为宗教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儒家是一个有宗教意识、宗教礼仪、宗教组织的社会实体，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全民信仰的“国教”；也有人认为，儒学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以“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为宗旨的学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具有宗教性教化功能，所以可以称之为一种准宗教。^[1] 本书认为，只要不拘泥于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概念，不以一神教的基本特征作为衡量是否宗教的唯一标准，那么，就应该承认儒学确实具有极强的宗教性。^[2]

与基督教相比，儒教的特点是，它没有外在的人格神信仰，也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教会）和专门的神职人员，但它把世俗的力量神圣化，独尊人间的神明（政权、帝王或无冕帝王、各级权威），把产生于人类社会的三纲五常神圣化为人类社会的绝对法则，因此，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儒教本质上是一种迷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如德国学者孔汉思在《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一书中说：“宗教并未把相对的受条件限制的人视为绝对权威，而只把唯一的神视作绝对权威；在我们的传统里，这个绝对权威自古以来被称为上帝。我所指的是那个隐藏的最初和最终的真实……而迷信则把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视为绝对权威并要求人们盲目服从。迷信把物质的东西，人或人组成的团体神化。从这点上讲，个人崇拜也同样是一种迷信！……一旦宗教把非本质的当作本质的，相对

[1] 参见苗润田、陈燕：《儒学：宗教与非宗教之争》，《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

[2] 参见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彭国翔：《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的当作绝对的，宗教就变成了迷信。”^[1]

作为一种信仰，儒教力图通过修身、养性、行善、节欲、仁义等来使凡俗的、平庸的人生在有限的时空中获得神圣的、终极的、不朽的意义，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与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宗教表达，儒教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把神圣的资源锁定在某些人和某些主义身上，偶像崇拜的倾向十分严重，而任何人，无论是尊贵的帝王还是天才的学者，作为具体时空中的存在，他们都有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与个人局限，同样，任何主义或学说，无论它的体系多么严谨深邃，作为历史的产物，也不可能具有终极的真理性。而当并不具有神圣性、绝对性和终极性的人间力量被视为具有宗教的神圣性、绝对性和终极性的真理时，其结果就是“必然走向极权、专制和个人神化”^[2]。

回首百年中国文学，可以看到，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与理性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信仰，但是，现实生活中迷信偶像和崇拜权威并未因此减少，“文革”时期造神运动更是登峰造极。在前进的道路上，即使是以无神论者自居的郭沫若、巴金、老舍、韦君宜等亦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崇拜权威、迷信人格神以及武断、粗暴、轻信、盲从的精神盲目，正如巴金晚年在《随想录》中所说，“文革”时期自己竟那样迷信，那样听话，那样愚蠢，“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3]应该说，20世纪中国作家的迷信、盲从与儒教之毒未能得到彻底清理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认为，深入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儒教的深层关联是十分必要的。

[1] （加）秦家懿、（德）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8页。

[2] 王四达：《宗教性的常态与变态：一个解读儒学的新视角》，《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

[3] 巴金：《灌输和宣传》，《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三

本书拟从以下八个方面展开研究：

(1) “以科学代宗教”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思潮：以陈独秀研究为中心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由于批判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政治、文化、道德、封建迷信等层面，未能充分注意到儒教的准宗教特质，因而在解构儒教对国人的精神控制，解放思想，培育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等方面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点，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十分典型，因此，本书首先从解析陈独秀的宗教观入手，探寻新文化运动中儒教批判的复杂性。

(2) 儒教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气”：以“非宗教运动”研究为中心

所谓“宗教气”是指并不信仰某一宗教，但却因把人间的某一精神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视为终极的、绝对的、无条件、绝不能质疑的真理，而在信仰的方式、心态及行为等方面表现得比真正的教徒还要狂热、武断、霸道、偏执的一种精神气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对知识分子的“宗教气”和教士人格予以高度重视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周作人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式的宗教，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并不比民众更少，尤其是在独断地相信自己或自己所在的群体掌握了超绝的客观真理、狂热地要求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绝对知识、随时准备接受一切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教条以

及对偶像崇拜等缺少应有的警惕等方面，教训十分沉重。应该说，周作人的批判独特而有深度，至今仍然有某些针对性。

（3）儒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罪感”意识：以鲁迅研究为中心

在宗教学里，所谓“罪”，是指违背自己对神圣者所作的信仰委身。如果说在基督教文化里，“罪感”与不服从上帝的戒律或律法相联系，那么在中华文化圈里，有中国特色的“罪感”则与不服从礼教密切相关。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指出：“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之路。”^[1]礼教在传统中国一直享有神圣的、绝对的崇高地位，违背或叛逆礼教，常会使人产生很深的罪恶感。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但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礼教”罪感却可以使一个原本无罪的人在沉重的“心罚”中走向死亡，且得不到任何同情和怜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这样的典型。与基督教相比，中国的儒教不是以人格神的上帝来管辖人的心灵，而是用被圣化为绝对律令的纲常伦理来全面掌控人的身心。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及国民党政府要员陈布雷的自杀身亡，均与这种宗教式的精神控制密切相关。鲁迅一生与儒教的这种宗教式的精神控制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4）儒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国家意识：以老舍研究为中心

20世纪中国，冲破了家族牢笼的个人常常在“国家”神话面前停步不前，以至于有人把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思想奴役视为20世纪中国人最难走出的精神迷宫。^[2]迫在眉睫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使绝大多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以“救国”为己任，为了国家的独立与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2] 参见袁伟时：《告别中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富强，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最可宝贵的个体生命自由，这一点在老舍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典型。老舍是基督徒，但一生以爱国为宗教，被巴金先生称为“伟大的爱国者”和“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1]，但也正是他在晚年喊出了埋藏在现代中国人心底最大的疑问：“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2]要解开老舍悲剧之谜，从儒教的角度，撩开其宗教性爱国观的面纱后，更容易看清真相。

（5）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宗教人”：以巴金研究为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宗教人”集中表现在“孝子”形象的塑造上，尤其是巴金笔下的“觉新”形象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宗教人”。本书以巴金研究为中心，探讨了觉醒的现代新人是如何被蔑视个体人格的宗教化儒教孝道所“吃掉”的。

（6）儒教与革命作家的准宗教心态：以韦君宜研究为中心

韦君宜的《思痛录》和《露沙的路》在20世纪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回首往事，韦君宜承认自己“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3]韦君宜的悲剧，是中国现代作家与儒教关系中的又一个典型。本书以此为中心，对中国现代革命作家掩藏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心态及其表现方式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和透视。

（7）儒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变”与“不变”：以郭沫若研究为中心

郭沫若的儒教思想主要来自王阳明的影响。留学日本时期，强烈的宗教情绪和宗教心理需求，使郭沫若对王阳明亦儒亦释的人生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王阳明的启发下，建构了一个能够消融一切差异的

[1] 巴金：《怀念老舍同志》，《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2] 老舍：《茶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3] 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抽象本体观。郭沫若认为，无论是王阳明的“理”，还是老庄的“道”、印度的“梵”，或是斯宾诺莎的“神”，作为终极本体，不同的只是名称，“只是衣裳”而已。^[1]从学术的意义上讲，郭沫若的抽象本体观价值不大，但从人生观的角度看，这种抽象的本体观却使他在人生的大舞台上进退自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或许没有一个作家能像他那样配得上是时代的歌手，有人称他是“时代肖子”，也有人讥讽他善于结欢于自己的时代。但是，当一些人指责郭沫若的趋时、善变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这种抽象的本体观为他提供了转变的精神机制。当从一种信仰转换到另一种信仰，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而不涉及到内在的精神本质时，快速、轻松、彻底地否定自我并完成思想改造就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了。同时，由于本体论信仰具有自我设定的性质，当人们以自己所信奉的本体论为正统时，必然要对异己者展开“圣战”，以保全自己对真理的独占和垄断地位，因此，它们常常又是压迫异端的导火索。在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这种“准宗教”的杀人之所以比政治性的“杀人”还可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正在这里。本书从儒教信仰的角度，对郭沫若的“变”与“不变”的两面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8）是儒家，但不是儒教徒：周作人的儒教批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较早从宗教迷雾中醒悟并真正摆脱了各种现代准宗教或世俗宗教束缚的启蒙思想家之一。终其一生，他不仅对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深入的思索，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掩盖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教士人格、教徒心理以及乌托邦理念等进行了独特的持久的批判，而且从

[1] 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页。

宗教与文学的历史渊源、现实联系、本质差异等角度，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本质进行了颇有深度的解释和把握。周作人认为自己的思想一半是释家，一半是儒家，本书从解读周作人独特的儒释观入手，指出从广义的宗教文化的角度对儒家思想的优长得失进行价值评估，力求解构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光环，使原始儒家思想中的富于理性和人道的思想精华发挥出来，并在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会通、权衡较量的过程中，形成既有中华文化之特色、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文明，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是周作人儒家思想的最大特色，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最大贡献之一。

[1]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第一章 “以科学代宗教”与新文化

运动中的反孔思潮

——陈独秀的宗教观及其写作策略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由于批判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政治、文化、道德、封建迷信等层面，未能充分注意到儒教的准宗教特质，因而在解构儒教对国人的精神控制，解放思想，培育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等方面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本章从解析陈独秀的宗教观及其对科学的宗教性书写来探索这一奥秘。

第一节 “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1]

一、提倡科学，反对宗教

“五四”时期，陈独秀力倡科学，反对宗教，主要原因有三：一是

[1]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页。